

再华化与印尼华人的身份重构

以印尼客家人为中心的考察 1

叶丽萍 华中师大印尼研究中心

【摘要】以印尼客家人这一华人次族群为个案，以身份构建为视角，论文通过考察印尼华人再华化的内生动力，揭示了再华化这一概念内涵的复杂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论文认为，再华化本质上是印尼华人在民主化改革后进行身份重构和争取合法权利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赋予“印尼公民”以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包容性的内涵。协调中国移民后裔与印尼公民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是印尼华人身份重构的根本任务。印尼客家人通过政治参与以及积极推动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和华文报刊的复兴，为再华化与印尼华人的身份重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印尼华人的再华化与身份重构都是未完成的事业，二者的未来走向既取决于印尼国内政治的变迁，也取决于印尼华人社会的选择与内聚力。

【关键词】印尼华人；印尼客家人；华人社会；再华化；身份重构

【作者简介】叶丽萍（1988—），女，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印尼华侨华人问题。

——原文载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再华化是当下海外传统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些华人社会通常在居住国的政治压力下发生过被迫的去华化过程。因此，再华化不仅是海外华人身份认同变化的结果，也是其身份重构的重要表现形式。事实上，公民身份重构不仅是个体的人主动或被动适应政治与社会环境变迁的过程，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再华化是海外华人在居住国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复兴和改造中华文化，一方面在居住国争取

平等且具有实质内容的公民身份，另一方面试图抓住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强与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这在客观上起到了巩固族群认同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华人是海外华人身份构建研究的典型案例，但现有的研究几乎都没有明确将印尼华人身份构建置于再华化与社会抗争的语境中来考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印尼与中国关系的改善、中国新移民的加入、印尼华人社会与东南亚国家华人社会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是印尼华人再华化的主要原因。这种解释分析了外部因素的作用，但没有深入考察印尼国内导致和推动再华化的因素以及印尼华人社会自身的内生动力。事实上，去华化与再华化都是印尼华人社会回应不同阶段的印尼现代国家构建的方式，目的都是通过处理既有的中华文化与居住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构建最适合生存与发展的公民身份。印尼实行民主化改革以来，华人仍面临着成为印尼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与执政当局治理失败“替罪羊”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再华化成为了印尼华人争取具有实质内容的平等公民身份和进行社会抗争的手段。

对于印尼民主化改革之后华人社会的变迁，现有的研究多局限在描述华文教育、社团、媒体、节庆习俗等具体的现象，而少有研究用身份构建视角将这些现象统合起来进行理论的阐释。笔者在印尼进行田野调查期间，走访了华人聚居的十几个城市，发现客家人在印尼华人再华化的进程中有较为突出的代表性。本文试图以客家人这一印尼华人次族群为个案，以身份构建为视角，通过考察印尼华人再华化的内生动力，来揭示再华化这一概念内涵的复杂性及其表现形式的丰富与多样。

一、印尼华人再华化的内涵、原因及动力

（一）去华化与再华化

华人移民海外之后，由于远离了中国，自然在不同程度上会被在地化，或者为了适应居住国生存环境的变化，会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去华化。这是跨政治边界、跨文化交往的必然结果。然而，华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自觉，它是保护以华人身份为基础的商业网络、风俗习惯、社会集团和宗教集团的必要条件。当我们将“华”的内涵界定为“中华文化”或“华人文化”，而不是“中国”、“中国公民”或“中国文化”，即主要关注海外华人社会文化特性的时候，去华化与再华化都并非是不可逆的身份构建过程。去华化与再华化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更重要的是，去华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中华文化特性，而再华化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恢复原先具有的“传统的”中华文化特性，或者模仿和移植“中国的”文化。总之，去华化与再华化既是自然、客观、外在的文化特性变迁过程，也是自觉、自为、内在的身份重构过程与策略。

马歇尔率先提出了“公民身份”这一概念，并且从权利视角来界定个体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身份内涵。他认为，公民身份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而这三种权利是民族国家分别在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进行基本制度构建的产物。也就是说，公民身份本质上是个体的人与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关系。事实上，对于任何社会群体而言，除了生物学特征上天然的同质性，保持、革新或重新构建相对独立的文化特性，以捍卫、巩固或争取现实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权利，是其在不断变化



华中师大印尼研究中心

的生存环境中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实践中，海外华人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自身的中华文化特性，或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自主地构建兼具多种文化特性的居住国公民身份，取决于他们是否正在遭遇或曾经遭遇居住国政府系统性的排斥与强制性的同化，而排斥和同化少数民族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当局构建统一民族认同、控制经济社会和巩固政治合法性惯用的策略。

1955年中国放弃了双重国籍政策之后，对于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海外华侨不得不在中国与居住国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对于如何构建自身在文化上的身份认同，海外华人却或多或少有相对自主的空间，而这种空间究竟有多大，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居住国采取的现代国家构建战略与相应的少数民族政策来决定的。对于那些主动选择加入居住国国籍，或者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保留中国国籍或再移民至第三国的海外华人而言，如果居住国政局稳定，并且采取较为平等包容的少数民族政策，他们会对居住国的主流文化产生较强的认同，进而会努力使既有的中华文化特性与主流文化和谐共生、相互融合，甚至主动选择去华化以高度融入主体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去华化将成为身份构建的主要方式，且不可逆性较强。相反，如果居住国政局不稳，并且采取排斥性的或强制同化的少数民族政策，甚至采取系统性的种

族或文化清洗政策，他们就不得不选择去华化，但正因为是被迫的、非自愿的，这种去华化往往也是不稳定的。一旦居住国政局和少数民族政策发生转变，再华化会作为华族争取正义的社会抗争的重要手段，重新塑造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与文化特性。

（二）印尼政治变迁与印尼华人再华化现象的产生

自从独立以来，印尼政府在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即实现国家格言中的“多元合一”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如何“调解华人性”的问题，为此，印尼政府先后采取了强制同化政策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苏加诺政府在內政上剥夺华人正当的经济权利，在外交上则亲近中国，试图借助中国力量抵御西方国家对印尼主权的威胁。这些相互矛盾的政策，不仅导致了印尼土著建国精英群体的分裂，也使得产生于殖民地时期的“华人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面对这种局面，以苏哈托为首的右翼军人集团试图通过建立威权政治秩序来强化国家统治能力。一方面，为了强化苏哈托个人的权威和威权政府的动员能力，苏哈托政权将华人视为损害土著族群利益和助长共产主义威胁的群体，进而对华人实行强制同化政策。所谓“强制同化”，是指通过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中推行边缘化、歧视和污名化的华人政策，迫使华人为了生存彻底抹去自身的中华文化特性并放弃华人身份认同，进而全面融入主体